税务研究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

林树山[1],李普亮[2]

(1. 惠州市国家税务局,广东 惠州 516008; 2. 惠州学院 经济管理系,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双双下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却逆势加快。基于 1978 ~ 2015 年的宏观统计数据,运用 VAR 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三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率与税收收入增长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税收收入增长率呈现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应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突破口,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持之以恒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确保应收尽收。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征管水平;VAR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9339(2017)03 - 0075 - 08

一、引　言

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税收增长的因素无疑是多元的,围绕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出现的税收高速甚至超速增长现象,学界提出了三因素论、多因素论和特殊因素论。[1]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对于税收增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尽管中国的税收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经济对税收的决定性作用并未发生动摇。然而,经济对税收的决定性作用既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同时也受制于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学界的相关研究看,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但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献中,郭庆旺和吕冰洋[2] 运用 1997 ~ 2002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提高明显有利于税收总收入的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性差异。万莹和史忠良[3] 对中国各地区间税收负担率与产业结构相关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现行税制下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税收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冯瑜[4] 运用统计模型对 1994 ~ 2010 年税收收入与三次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三产业经济增加值增长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但第一产

[收稿日期] 2016 - 08 - 23

[基金项目] 广东省国税局税收科研项目"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2016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税收持续增长背景下财政民生支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项目编号:HZXY20140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税收和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5A030313676)

[作者简介] 林树山(1960 -),男,广东龙川人,惠州市国家税务局局长;李普亮(1980 -),男,山东莱芜人,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业经济增加值与税收增长呈负相关。贾莎[5]实证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税收超速增长的贡献，测算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后宏观税负变动中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在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自身税负率的不断提高是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韩秀兰和王久瑾[6]采用对数平均 D 氏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山西省地方税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结论显示，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产出效应最大，产业结构效应次之，行业税负效应最小。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税收增长的态势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何客观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白景明[7]从学理角度分析了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向非固定系数性对应关系，从结构角度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税收增长的正能量；其中，第一产业规模稳定是税收增长的基本支撑力，第二产业持续发展是税收增长的稳定器，第三产业地位提升是税收增长的加速器。李普亮[8]基于中国 31 个省份 2007 ~ 2013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效应，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在统计上显著促进了税收收入总量增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收入增长速度。

总体来看，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可为本文提供有益启示，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尽管经济决定税收，但税收也会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税收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相互影响，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久性。以往的同类实证研究一方面通常忽略了三个变量间相互影响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倾向于考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静态影响，忽略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运用较为成熟的 VAR 模型不仅有效克服了已有文献在模型设定和估计方面的缺陷，而且可以更好地刻画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是对学界同类研究的新拓展。

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增长的轨迹：1978 ~ 2015

（一）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张，名义 GDP 由 1978 年的 3650.2 亿元增至 2015 年的 676 708 亿元，增长了 184.4 倍，年均增长 15.2%。但 GDP 增长率在不同年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1978 ~ 2015 年间，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整体比较吻合，但前者的波动性较后者明显更强。具体来看，过去的 38 年中，名义 GDP 最高增速高达 36.4%（1994 年），最低增速仅为 6.2%（1999 年），前者高于后者 30.2 个百分点，标准离差为 7.1 个百分点；实际 GDP 最高增速为 15.2%（1984 年），最低增速仅为 3.8%（1990 年），前者高于后者 11.4 个百分点，标准离差为 2.7 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转向中高速。由图 1 不难发现，2012 年至今，无论是名义 GDP 还是实际 GDP，增长率均持续回落，其中名义 GDP 增长率由 2012 年的 10.3% 降至 2015 年的 6.4%，同期的实际 GDP 增长率由 7.7% 降至 6.9%。尽管 2012 年之前我国 GDP 增速也曾经历过持续下跌的阶段，比如 1995 ~ 1999 年，名义 GDP 增长率由 26.1% 降至 6.2%，实际 GDP 增长率由 10.9% 降至 7.6%，但自此之后，GDP 增速又出现较大幅度反弹，重回以往的高速增长轨道。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 GDP 增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稳定在目前的中高速水平，很有可能呈现 L 型的增长轨迹，出现 U 型或 V 型反弹的可能性较低。“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未来五年经济年均增长率确定在 6.5% 以上，这也预示决策层对经济放缓有着较高的容忍度。

（二）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

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逐步趋于优化。1978 ~ 2015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整体上趋于下降，由 1978 年的 27.9% 降至 2015 年的 9.0%，累计下降 18.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相对比较平稳，保持在 40% ~ 50%，并且自 2011 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 2015 年降至 40.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波动中趋于上升，由 1978 年的 24.5% 升至 2015 年的 50.5%，累计增加 26 个百分点，其中 2012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并且 2015 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 50%。由于学界和官方通常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度量指标，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演进轨迹表明，全国层面的产业结构正在持续优化升级。

（三）税收增长率的演变轨迹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税收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由1978年的519.28亿元增至2015年的124 892亿元，增长了239.5倍，年均增长16.0%。与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轨迹相似，税收增长率也在不同年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其中，最高增速达到115.4%（1985年）①，最低增速仅为2.4%（1987年）。从全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1978～1984年，这一比重相对比较平稳，维持在13%左右，受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的影响，1985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达到峰值22.6%，之后这一比重持续下跌至1996年的9.7%。自1997年起，我国税收收入走上高速增长轨道，税收占GDP比重一路飙升，由1997年的10.4%升至2012年的18.8%。但自2013年以来，税收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开始降至个位数水平，税收占GDP比重呈现稳中略降的特征。

（四）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与税收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对税收的决定作用不仅取决于经济规模，同时也取决于经济结构。下面本文将经济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税收增长率置于同一框架，以便为分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提供直观证据。虽然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的变化趋势非常吻合。通过进一步绘制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的散点图，发现二者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见图1）。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经济决定税收的原理。新常态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税收收入增长也相应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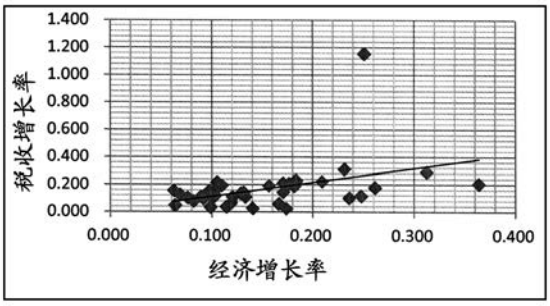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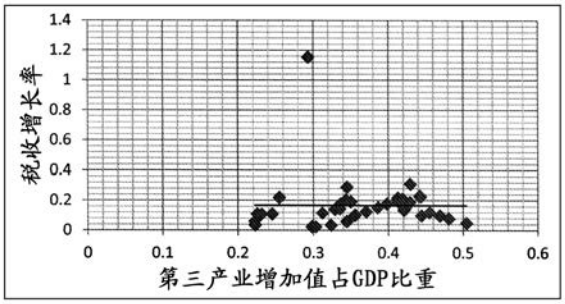

图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税收增长率散点图

但通过图2观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税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时，我们发现，二者的演变轨迹存在较大的偏差，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同时，税收增速却在不断下降。随后我们进一步绘制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税收增长率的散点图，结果发现，二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人们的直觉并不吻合，但这是否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税收增长，尚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按照这一逻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税收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而且彼此之间的影响往往存在一定的持续性，采用传统的回归模型不仅难以避免变量的内生性，更关键的是无法准确刻画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相比之下，VAR模型可以有效克服传统回归模型潜在的不足。VAR模型首先由Christopher Sims（1980年）引入经济分析中，这种模型不以任何理论为依据，不带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其将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能够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结构，捕捉到数据的更多特征，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因而在实证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中被广泛应用。一个VAR（p）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Y_t = \mu + A_1 Y_{t-1} + A_2 Y_{t-2} + \cdots + A_p Y_{t-p} + \varepsilon_t \quad (1)$$

① 1985年的高税收增长率主要是由1983和1984年的“利改税”导致的。剔除这一特殊年度外，税收增速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达到31.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中，Y_t 是 k 维内生变量向量，p 为滞后阶数，$k \times k$ 维矩阵 $A_1, A_2, A_3, \cdots, A_p$ 为被估计的系数矩阵，ε_t 为 k 维扰动向量，满足如下条件：

$E(\varepsilon_t) = 0$; $E(\varepsilon_t \varepsilon'_t) = \Omega$; $E(\varepsilon_t \varepsilon'_{t-k}) = 0$（k 不为 0）

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因此模型（1）中的内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gdprate）、产业结构（stru）和税收增长（taxrate）。其中经济增长（gdprate）用名义 GDP 增长率表示，产业结构（stru）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示①，税收增长（taxrate）用税收收入增长率表示。则模型（1）可具体化为如下形式：

$$\begin{pmatrix} gdprate_t \\ stru_t \\ taxrate_t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mu_1 \\ \mu_2 \\ \mu_3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delta_{11.1} \delta_{12.1} \delta_{13.1} \\ \delta_{21.1} \delta_{22.1} \delta_{23.1} \\ \delta_{31.1} \delta_{32.1} \delta_{33.1} \end{pmatrix} \times \begin{pmatrix} gdprate_{t-1} \\ stru_{t-1} \\ taxrate_{t-1} \end{pmatrix} + \cdots + \begin{pmatrix} \delta_{11.p} \delta_{12.p} \delta_{13.p} \\ \delta_{21.p} \delta_{22.p} \delta_{23.p} \\ \delta_{31.p} \delta_{32.p} \delta_{33.p} \end{pmatrix} \times \begin{pmatrix} gdprate_{t-p} \\ stru_{t-p} \\ taxrate_{t-p}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varepsilon_{1,t} \\ \varepsilon_{2,t} \\ \varepsilon_{3,t} \end{pmatrix} \quad (2)$$

本文实证分析涉及的原始数据来源如下：1978～2014 年名义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及税收收入数据源于 2015 年度《中国统计年鉴》；2015 年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源于 2015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全国税收收入源于财政部官方网站。GDP 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二）实证分析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构建 VAR 模型之前，本文首先利用常用的 ADF 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此判断各个变量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不难看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gdprate 和 stru 都是不平稳的，但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taxrate 及其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变量。因此，可以利用上述变量构造 VAR 模型。

表 1　变量的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K）	AD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gdprate	（C，N，4）	－2.437	0.140	不平稳
△gdprate	（N，N，4）	－4.289	0.000	平稳
stru	（C，T，7）	－2.966	0.158	不平稳
△stru	（N，N，5）	－5.271	0.000	平稳
taxrate	（C，N，0）	－5.800	0.000	平稳
△taxrate	（N，N，8）	－5.126	0.000	平稳

注：检验形式（C，T，K）中，C 表示含漂移项，T 表示含趋势项，N 表示不含趋势项或漂移项，K 表示检验式中附加项（因变量滞后项）的个数，其中滞后阶数基于 AIC 得出。

2. 滞后阶数的选择

构造 VAR 模型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合理选择模型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既要能够充分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又要避免因滞后阶数过大影响模型的自由度。根据表 2 显示的检验结果，LR、FPE、AIC、SC 和 HQ 等信息准则均支持最优滞后阶数为 1 的选择。因此，本文构建 VAR 模型时将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 1。

表 2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97.95082	NA	8.84e－07	－5.425761	－5.292446	－5.379741
1	185.4783	155.0487*	9.97e－09*	－9.913045*	－9.379783*	－9.728963*
2	192.2397	10.81819	1.15e－08	－9.785123	－8.851914	－9.462980
3	196.6334	6.276791	1.54e－08	－9.521909	－8.188754	－9.061704

注：* 代表各选择标准标示的滞后阶数。

① 这是学界和政界度量产业结构升级最常用的指标。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另外，VAR 模型的稳定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条件。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 VAR(1) 的稳定性。由图 3 看出，VAR(1) 的 AR 特征多项式逆根均小于 1，没有在单位圆之外，因此，VAR(1) 是稳定的，可以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

3. 协整分析

VAR 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的 VAR 模型施加约束以后得到的 VAR 模型，它的滞后期是无约束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6] 前面的分析表明，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因此，协整检验的 VAR 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为 0。表 3 和表 4 显示了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迹统计量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taxrate、gdprate 和 stru 三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对应的长期方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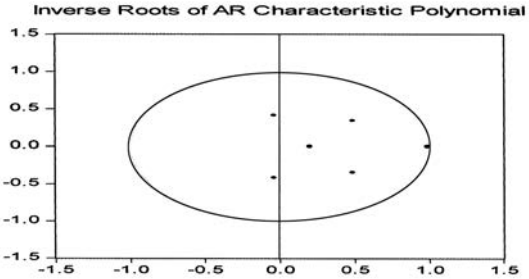

图 3　VAR(1) 的 AR 特征多项式逆根图

$$taxrate = 0.998gdprate - 0.166stru + e \quad (3)$$
$$(0.333) \qquad (0.299)$$

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迹统计量检验)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Trace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Prob. **
None*	0.593579	42.35059	29.79707	0.0011
At most 1	0.214129	9.037086	15.49471	0.3620
At most 2	0.003277	0.121461	3.841466	0.7274

注：* 代表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代表 Mac Kinnon-Haug-Michelis(1999) P-values。

表 4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Max-Eigen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Prob. **
None*	0.593579	33.31350	21.1362	0.0006
At most 1	0.214129	8.915625	14.26460	0.2932
At most 2	0.003277	0.121461	3.841466	0.7274

注：* 代表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代表 Mac Kinnon-Haug-Michelis(1999) P-values。

从方程(3)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dprate) 与税收收入增长率(taxrate) 呈现正相关，并且系数在统计上比较显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stru) 与税收收入增长率(taxrate) 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VAR 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实证分析中往往不太关注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具体影响，而是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原理来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VAR 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即期和远期取值的影响。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因此仅给出经济增长率(gdprate)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stru) 当期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后，税收收入增长率(gdprate) 的脉冲响应曲线(见图 4 和图 5)。图中，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以年为单位，纵轴代表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响应程度，实线部分表示给定外生冲击下变量脉冲响应函数随时间的变化路径，虚线部分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由图 4 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gdprate) 的正向冲击产生后，税收收入增长率(taxrate) 会产生正反应，在第 2 期达到高点后逐步下降，到第 10 期时，这种正反应虽然已稳定在较低水平，但仍然略大于 0。这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张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具有较强的持久性。经济扩张会形成更大的后期投资和消费扩张空间，从而带来税收的滚动性增长，即 GDP 与税收两者的同向变动是周期性的而非年度性的。[7] 但进一步观察图 5 却发现，税收收入增长率(taxrate) 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stru) 的脉冲响应程度一直略低于 0，这表明，产业结构的正向冲击产生后，税收收入增长率反而产生了负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反应，这与产业结构升级会促进税收增长的预期不够吻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以 2012 年为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37.1%，这些行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对税收贡献相对较小，而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创意和设计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发展对税收增长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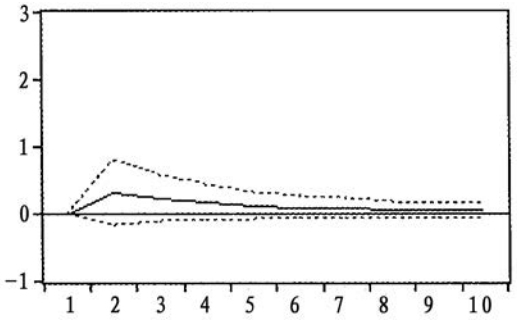

图 4　taxrate 对 gdprate 的脉冲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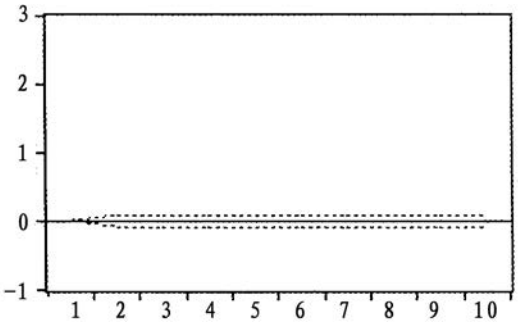

图 5　taxrate 对 stru 的脉冲响应

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可以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表 5 给出了税收收入增长率(taxrate) 的方差分解表。不难看出，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冲击对自身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度最大，直到第 10 年，其贡献度仍然高达 94% 以上，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这一贡献度呈现稳中有降的特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冲击对税收收入增长率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度均逐年攀升，但前者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后者，直到第 10 年，前者的贡献度达到 5.49%，后者的贡献度仅为 0.097%。这表明，经济对税收的决定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总量而非经济结构。

表 5　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方差分解表

Period	S. E.	taxrate	gdprate	stru
1	0.184184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0.186814	97.23694	2.756610	0.006451
3	0.188118	95.91411	4.071382	0.014506
4	0.188787	95.24975	4.726347	0.023899
5	0.189146	94.89932	5.066307	0.034371
6	0.189350	94.70332	5.250975	0.045708
7	0.189475	94.58547	5.356791	0.057741
8	0.189559	94.50835	5.421306	0.070347
9	0.189620	94.45310	5.463457	0.083441
10	0.189669	94.40997	5.493068	0.096960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双双下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却逆势加快，深入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税收增长的关系会影响到如何看待未来税收增长潜势、如何培育税源结构和如何推进税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基于 1978 ~ 2015 年的宏观统计数据，运用 VAR 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三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率与税收收入增长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税收收入增长率呈现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冲击产生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正反应在第 2 期达到高点后逐步下降，直到第 10 年，这种正反应仍然略大于 0，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税收增长的正向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但税收收入增长率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脉冲响应程度一直略低于 0，这表明，产业结构的正向冲击产生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后，税收收入增长率反而产生了负反应。进一步的方差分解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冲击对税收收入增长率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度均逐年攀升，但前者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后者，这表明，经济对税收的决定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总量而非产业结构。

（二）政策建议

1. 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突破口，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增长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很难重返过去的高速增长轨迹，面对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不能对经济增速的下滑放任自流，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稳增长的政策举措，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态势，确保“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达到 6.5% 以上，这是促进税收持续增长的基本要求。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内在要求，只有实体经济正常扩张并不断实现结构裂变，税源才会源远流长。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举措，通过战略规划、资金补贴、政策倾斜等，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快速转移。我国必须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列为宏观政策基调，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延展产业链、拓展产业面，进而丰富税源。为此，必须营造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正税清费和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同时，坚持多管齐下，不断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和政务服务成本，通过实施政策“组合拳”全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水平，激发各类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投向实体经济的积极性。

2. 持之以恒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正向冲击对税收增长带来了负向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贡献，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程度还会逐步提升。事实上，尽管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是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常用指标，但在实践中不能单纯追求统计意义上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关键是要注意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以 2015 年为例，尽管全国税务机关组织的税收收入较 2014 年仅增长了 6.6%，但第三产业税收增长 7.6%，比第二产业税收增速高出 5.5 个百分点，从增收的贡献看，第三产业税收增量占全部税收增量的 80%。从第三产业内部构成来看，互联网、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税收增速更为强劲，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收增长 23.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 21.2%，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 19%。显然，第三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税收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大力发展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现代服务业是推动税收加速增长的内在要求。但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内部具有“三高”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占比仍然偏低，今后要进一步强化这些类型行业的发展，确保第三产业有质量、有效益地增长。为此，要积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落实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综合采用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加快成长，不断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确保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税收增长的协同。

3. 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确保应收尽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依法课税提供了经济源泉，但税源向税收的充分转换需要税务机关的严征细管。为此，各级税务机关应秉承依法治税的思维，以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和国地税深度合作为契机，以税收风险为导向，认真实施“互联网 + 税务”行动计划，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不断优化纳税服务，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行为，努力提高纳税遵从度，既不征收过头税，又要应收尽收，既要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又要努力做到公平征税。与此同时，顺应“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诉求，积极构建面向自然人的税收服务管理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法人、非盈利组织、自然人之间税收征管的均衡布局。

参 考 文 献

[1] 高培勇. 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 [J]. 经济研究，2006，(12)：13－23.

[2] 郭庆旺，吕冰洋.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J]. 涉外税务，2004，(9)：11－16.

[3] 万莹，史忠良. 中国地区间税收负担率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以 2007 年数据为例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6)：21－24.

[4] 冯瑜. 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分析 [J]. 税务研究，2011，(7)：84－8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5] 贾莎. 税收“超速增长”之谜: 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J]. 财政研究,2012,(3):34-36.
[6] 韩秀兰,王久瑾. 地方税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基于对数平均 D 氏指数方法的分解分析 [J]. 税务研究,2013,(12):61-64.
[7] 白景明.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 [J]. 财经问题研究,2015,(8):56-61.
[8] 李普亮. 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 抑制还是促进 [J]. 税务与经济,2016,(1):67-74.
[9] 陈时兴.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挤入与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 1980-2010 年的中国数据 [J]. 中国软科学,2012,(12):169-176.

责任编辑: 王 焱

Dynamic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Tax Revenue Increase in the New Normal

Lin Shu-shan[1], Li Pu-liang[2]

(1. Huizhou Municipal Local Taxation Bureau, Huizhou 516008,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the tax revenue growth rate is going down. On the contrary,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moving up. Based on the macroscopic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78 to 2015, the VAR model is appli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dynamic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tax revenue growt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creased value in GDP and the tax revenue growth rate. Meanwhile,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the tax revenue growth rate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creased value in GDP and the tax revenue growth rat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hich is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real economy and target medium-high economic growth. It is still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tantly and cultivate new tax revenue growth. Last but not least, it is still vita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ensure full collection of receivables.

Keyword: economic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tax revenue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VAR model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